

不可重构的美术史

——读臧杰著《青岛美术寻踪》

■王宏芳(宁夏固原市职业技术学校)



《青岛美术寻踪》卷一之徐詠青
臧杰/著
中国海洋大学出版社/出版

近年来,臧杰陆续出版关于青岛的文学史和美术史书籍,我想这跟他从事文学、艺术史学工作的地域青岛是分不开的。他的著述主要围绕文化批评与研究、近代美术史料研究文学轶事等。著有《民国美术先锋》《民国影坛的激进阵营》《天下良友》《艺术功课》《大师的背影》等,主编有《良友》《闲话》《闲话文坛》《大家文库》……

今年三月臧杰的新作——由中国海洋大学出版社出版的新书《青岛美术寻踪》,涵括了《中国水彩先驱徐詠青》《油彩青岛》《青岛美术史稿》三卷。著作中可以看到国画、油画、水彩、版画、雕塑、年画、连环画在青岛的一个在地性发展脉络。长期以来,自己作为一名文艺史学追随者,总是碎片化地读着部分艺术史学,而臧杰的这三本著作是青岛近现代美术史首次系统书写的书籍,依托策展实践、文献收藏和口述历史采集,通过查寻勾稽、调查采访,历时十年积累。是拥有扎实的史料搜集梳理的基础上由臧杰对本土艺术文献的发掘、整理与研究著述完成。书中史料、图像、轶事梳理出的个性独具的艺术人物形象,对各种流派画作画风及技巧形式也有独到的挖掘与深入的理解梳理,对于个人治史者而言绝非易事。这需要清醒的艺术史观的认知。

其中,《中国水彩先驱徐詠青》以徐詠青先生晚年寓居青岛的7年为突破口,全面理清了“中国水彩第一人”徐詠青一生的脉络,这对于一位在美术史上“作品缺失”的画家而言,这些作品的呈现尤为不易,涵括水彩、月份牌画、素描、速写、漫画等,这些作品让享誉于画坛的水彩画大师徐詠青带着诸多绘画作品鲜活地重新回到大众视野。作为寻找“复活”的重要文化记忆,该著述填补了中国现代美术史和水彩画史的研究空白,对青岛水彩的追本溯源、明确宗师与艺术传承的谱系、融汇互证青岛水彩史和中国水彩史的关系,丰富了整个美术史。不但阐释清了徐詠青是中国水彩画的先驱,同时又暗含着他为发展中国艺术教育事业作出了重要贡献。人类精神的创造物不仅有审美视觉性,也有文化或政治的视觉性,以及

其他视觉性。这就由阅读者本身研究的方向和领域包括认知决定了读者能从书中挖掘到自己需要的点。在徐詠青从水彩画领域淡出,逐渐被定格为一名月份牌画家后,其后续地位、声名的沉降是难以抑制的。如同书中由之回看包豪斯运动在西方艺术现场的革命性意义以及中国工艺美术的学院化致力历程,会引发另外一个向度的思考,也会更加深化对罗杰·弗莱所示结论的体悟。而从这样一个维度上去重新审视与认知对徐詠青的生命和艺术历程的追寻,也许会升华出超越艺术个案研究的意义,使之拓展成一个更辽远、更可深查细究的学术课题。

《油彩青岛》全面梳理了包括徐詠青、王济远、刘海粟始,延及李剑晨、倪貽德、庞薰琹、吕斯百、张充仁、吴冠中等40位中国现代美术家在青岛写生创作的状况,以百余幅经典油画和水彩写生的搜集,以破译青岛写生的机缘和际遇为着手点,对来青岛写生的画家的个案研究,从图像的视角观照青岛美术史,又对油彩图像的多样性进行分析和对绘画的风格研究,由此带出了他对青岛油彩图像史的总体思考,其中家国与时代对艺术本身的影响对艺术创作和风格、题材和技术的影响也是阅读本书带来的思考。

纵观《青岛美术寻踪》以创作种类、地域和艺术家三个维度切入,强调线性发展过程中的网状结构,既包括体制的结构,也包括人事的结构,还包括美术创作与“生产”的结构,以期发现美术创作的内在驱动力。结合文献用娴熟的专业技巧为我们揭开一些蒙尘已久的神秘画家的面纱,理清了许多历来困扰大家的问题,诸如画家生卒年、生活环境、履历、交游、师承、画迹等。在青岛美术和史学中诸多画家经由了留学西洋,和从东洋学西洋的过程,随着时间和实践的历程,画家们不约而同地辨识和探索着中国油画中国画的道路,阅读过程也是一个审美历程,画家们都在用实践进行审美的表达,并以地域性呈现着近代青岛美术史中西艺术的融合和趋同,体现出中西绘画的反抗、裂变与本土重生。从青岛美术史研究中也反映出在特定的历史条件下,区域美术史可能是整体美术史的主流。区域史研究不仅是对主流历史的丰富与补充,在特定的时期,可能代表着国家的意志,体现出的就不单单是局部的,更是整体的。

美术史书的书写,尽管具有专业性、地域性,但它与社会生活史、意识形态史紧密关联,青岛美术寻踪“从反映外部世界转到表现内心世界”——在本书中得到了比较充分的呈现。按汉学家魏斐德的话说:世界史织入了地方事件,地方事件织出了世界史,而中国也改变了。换言之:中国美术史织入了地方事件,地方事件织出了中国美术史,而“重构”了中国美术史。

可爱云岩日日游

——《沈周诗画中的江南》内文选摘

■王瑀(中央美术学院人文学院)



沈周诗画中的江南
王瑀/著 吴中博物馆/编
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

“雨后振孤策,逍遥往踪。”成化十二年的五月初一(1476年5月23日),雨后初霁。沈周带着精心备下的佳酿珍馐,匆匆策舟赶往虎丘。他满心期待,希望能追上来自南京的好友吴理(字元玉),以弥补自己前一天未能如约陪游的内疚。

遗憾的是,他们终究还是错过了。当得知吴理已经发舟离去,惆怅不已的沈周只好黯然徘徊于熟悉的泉声松影之间,一边“当杯啼高松”,一边慨叹“独酌不成醉”。

这场爽约令沈周挂怀。后来,吴理的表弟吉之向他索画,沈周便绘制了一件《山水图》作为酬答。这件《山水图》以云雾缭绕的山峰为背景,似乎有意要表现出失约那天多雨的反常天气。“今年雷雨颇发怪”,尽管只是四五月份,吴中却已是“青梅未黄雨满城”。正是这恼人的雷雨,打破了沈周与吴理同游虎丘的约定。在画面的左上角,作者抄录下那首后来独游虎丘时所得的律诗。他希望吉之在读毕这首题诗后,亦能感受到自己这个“后期之人之落寞”。

“水部先生太伯后,谦然其仪气凝厚。”吴理是成化五年(1469)的进士,祖籍吴江,故而成化十二年的这次姑苏之行对他来说,亦是还乡之旅。彼时,他刚从南京工部下属的屯田清吏司转到都水清吏司任上不久。沈周故此称其为“水部先生”,并将他与周代奔吴的泰伯联系在一起——不仅因为吴理是这位吴地人文始祖的后代,更因泰伯亦曾以治水之功开拓吴疆。吴氏不仅擅长诗文,还精于绘事。后来的《画史会要》便说他“山水法夏珪”。不过,沈周显然并不这么认为。吴理此行曾在城中向沈周展示过一件自绘的江山长卷。在彼时已经五十岁的沈周看来,此卷“多从顾陆发其源,旁探董巨真好手”。不仅取法自五代北宋的山水名家董源、巨然,更可直追魏晋之际的顾恺之、陆探微,“当代疑无与之偶”,溢美之情可见一斑。不难想象,这样一位“重量级”的朋友最后竟然与自己“不醉而别”,实在不能不让沈周深感“落寞”。

沈周向来十分重视送别友人,而虎丘正是他最为钟情的饯别之地。早在天顺五年(1461)的春天,三十五岁的沈周就曾在这里送别即将赴河南上任的刘昌,并劝慰他“故乡不足怀,功名在烜赫”。

“出吴阊门走山塘,山塘北去七里长。平郊崛起虎丘寺,云树一簇攒苍苍。”从苏州城西北的阊门下舟,顺着七里山塘

北上,便可直抵虎丘山前。这座郁郁葱葱的小土丘孤零零地矗立在平原之上,与山顶巍峨的云岩寺塔共同构成了苏城最为醒目的地标之一。除去景观上的意义,虎丘还承载着吴地厚重的历史与文化。传说吴王阖间安葬于此,其后曾有白虎显现守护,土丘便因此得名。东晋时的王珣与王珣两兄弟曾在山下立宅,后又将私宅捐为东西两寺,这便是虎丘云岩寺的前身,“云岩”亦成为虎丘的别称。历代文人骚客多喜以此地为题吟诗作赋,当地居民也热衷于来这里游玩祈福。这样的盛况,直到永乐宣德年间依然不减,就连远在北京的杨士奇也有所耳闻:“余闻虎丘据苏之胜,岁时苏人耆老壮少闲暇而出游者,必之于此。”除了一般民众,“士大夫宴宾客,亦必之于此。四方贵人名流之过苏者,必不以事而废游于此也。”看来,在虎丘宴请和饯别宾客,早已成为当年苏州文人圈里重要的传统。这或许也是沈周与吴理相约在此话别的原因。事实上,就在沈吴之约的一个多月前,沈周还曾在此为即将返回湖州的名医唐广举酒饯行。

大约就在吴理离开苏州后的第二年,同样出身吴门的徐源(字仲山)受命前往山东治水。作为同行,时任北京工部都水清吏司主事的徐氏显然取得了较吴理更为显赫的工作业绩。在徐氏的治理下,山东地区“运河水满万艘通,汶泗交流无壅土”。除此以外,他似乎对治理泉水尤有心得,其在任满之际编纂刊行的《山东泉志》影响广泛。对于这位同乡的事迹,沈周早有耳闻。成化十六年(1480)的正月,彼时已在山东工作近三年的徐源即将离苏返鲁。沈周专门在虎丘五台山麓设下酒宴为他饯别。席间,沈周和韵写下“此丘亦有泉,名赖陆羽好”的诗句,意在提醒徐源工作之余别忘了故乡虎丘的甘泉。

趁着月色煮泉品茗,不过是沈周夜游虎丘的内容之一。就在和徐源话别的前一年,也就是成化十五年的四月九日(1479年4月30日),原本打算前往西山的沈周因为天色将晚,转而舣舟虎丘,投宿山寺。一个月前,他刚刚经由虎丘东北的长荡路过此地,前往西山的隆池阡祭拜亡父。

月色微茫,沈周独步于剑池旁的千人座上。千人座又称千人石,相传晋宋之间的高僧竺道生曾在此讲经说法,是虎丘名胜之一。“一山有此座,胜处无胜此。”沈周对千人石情有独钟。这块巨大而平整的石体,不仅形态迥异,就连暗紫的颜色亦有别于周围的山岩。“其脚插灵湫,敷霞面深紫。”这样的奇异外观引发了沈周的兴趣,直呼其为“玛瑙坡”。

不同于寻常的日游,夜游千人石的体验令沈周难忘。不仅被他用画笔记录下来,也吸引了友人们纷纷为其唱和。独自在夜晚的虎丘,没有离愁,却可忘忧。

“可爱云岩日日游”,在与老友周鼎(字伯器,号桐村)的和诗中,沈周将自己对虎丘的喜爱表达得如此直白。对他而言,虎丘的“可爱”显然并不简单——这里不仅留下了他频频游玩的足迹,也见证了它与朋友们难舍难分的情谊。